

# 论戊戌前后的教育改革

吕 达

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后,面临着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在瓜分豆剖之祸迫在眉睫的关头,维新变法的浪潮越来越激荡。到戊戌(1898年)前后,我国的维新变法运动达到了高潮。值得注意的是,以废八股、变科举、兴学校、学西方为纲领的教育改革,是这场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探讨:(一)戊戌前后教育上改革思潮的出现,为什么势在必行?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是怎样爆发的?(二)戊戌前后教育上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实质和焦点是什么?(三)这场斗争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历史功绩和教训?

## (一)

清朝后期,由于列强军舰大炮的入侵,加上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清廷在政治上感到内忧外患,腹背受敌,经济上则财政拮据,入不敷出。这种政治经济衰败的局面,反映到教育领域,是一派萧条败落、空疏腐化的景象。支配全部教育的科举制度,腐化程度达到极点。私通关节、冒名顶替、营私舞弊、骗取功名的丑行屡见不鲜。当时虽然也有学校与科举相辅而行,但是各级各类学校名存实亡,不过是科举的附庸而已。甚至考课也只具虚文,由所谓教授到考点,点点学生名册,收收费币而已。通过不正当手段猎取功名的士子,不学无术是不足为奇的。“乡里子弟,读书十年,……而不能作一书札,”“通人学士,或有问一里之长果几许,无能答者。”<sup>①</sup>更有甚者,“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sup>②</sup>“自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刑不识,更不足责也。”<sup>③</sup>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蓄,破坏人才,国道贫弱。”<sup>④</sup>封建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空疏无用,不可能培养出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已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地步。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地主阶级中具有远见卓知的知识分子代表,如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等人就已经看到了上述危机,因而主张向西方学习,改革旧的教育。到了六、七十年代,在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入侵的刺激下,中国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企业,成为最早的资产阶级,因而在思想界出现了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改

① 徐勤:《中国除害议》,《戊戌变法》第3册第123页。

② 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209页。

③ 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344页。

④ 严复:《救亡决论》,《戊戌变法》第3册第63页。

良派。他们进一步要求改变封建愚昧主义的教育政策,改革乃至取消科举、八股的取士制度,设学校,采西学,借以培养人才,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文武科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欲得真才,必先自废时文始。”<sup>①</sup>主张“我国极宜筹款,广设艺院,教育人才”。他们指出,“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如果“文试而不废时文,武试而不废弓矢,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辙。”<sup>②</sup>这个时期,产生了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学校教育,如1878年张焕纶在上海创办的正蒙书院,便是中国私人创办的一所最早的分科设教的新型学校。同时,洋务教育也应运而生,教学内容加进了外国语和近代科技知识,对旧的教学方法也作了改变。

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朝野震惊,中国面临“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的局面。“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sup>③</sup>这个呼声汇成了这个时期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为了中国的独立富强,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变法,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

维新派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良好的教育;为了变法,必先改革教育。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急于教育。”<sup>④</sup>梁启超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sup>⑤</sup>他还指出:“欲兴学校、培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sup>⑥</sup>

## (二)

戊戌前后的教育改革同政治上的改革一样,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斗争。要不要废八股变科举兴学校?要不要学西学,如何学西学?这是戊戌前后教育改革与反改革斗争的焦点。

资产阶级维新派激烈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揭露这种制度充满弊病: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sup>⑦</sup>不可能真正选拔出真才实学的人才。他们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sup>⑧</sup>又说:“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sup>⑨</sup>维新派从西方的船坚炮利、声光化电,进而认识到改革教育,兴学育才的重要性,开始懂得了“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的道理。<sup>⑩</sup>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他们因此建议“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sup>⑪</sup>要求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篇·变法自强》,《戊戌变法》第1册第138—139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下》,《戊戌变法》第1册第55页。

③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④ 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第4册第9页。

⑤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戊戌变法》第3册第21页。

⑥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139页。

⑦ 同①

⑧ 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隶试士改用策论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211页。

⑨ 同④第218页。

⑩ 《湘报》第165号。

⑪ 同④

全国各省、府、州、县、乡学习西方学制，开办学校，“使天下人才皆出于学堂，天下之官以皆学堂诸生出身，”<sup>①</sup>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培养人才。

在教育制度上，对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来说，科举制度能“束天下豪杰于寻章琢句之中，以柔其犷悍横逸不驯之气”，“否则人人称帝，人人称王，……天下之大，六合之众，谁受钳束，谁受笼鉴？”顽固派死抱着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不放，就是为了推行愚民政策，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有一个时期，他们甚至对洋务教育也不能容忍。早在京师同文馆教授外国语、天文、算学等西学的时候，顽固派倭仁就曾上书竭力反对，认为那样做是“变而从夷”。这班花冈岩脑袋的顽固分子整天做着“以拙制巧”、“用夏变夷”的昏梦，把业已腐朽的封建制度看得神乎其神，鼓吹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艺。”<sup>②</sup>认为提倡学技艺是“重名利，轻气节”，会造成邪气弥炽。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际，顽固派仍然一脉相传，有的官员竟上书说什么“与洋人战不当用枪炮，当一切弃置，而专用气。”<sup>③</sup>甲午战争后，顽固派的思想也并没有什么变化。

当时封建统治集团中的另一派是洋务派，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他们对八股、科举的弊病并不是没有看到。比如张之洞也说过，八股取士的科举“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胜而质衰，法久而弊起……”，“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sup>④</sup>但是戊戌时期，“不闻其上折请废之者，”而只是主张“存其大体斟酌修改之”。这其中的缘故，正如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梁在《戊戌政变记》中还记载：1898年当他联合在京应试举人联署上书请废八股时，“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康有为的遭遇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废八股的诏书下达后，“愚陋守旧之徒，骤失所业，恨康有为特甚，至有欲聚而殴之者。”反对彻底改革乃至废除八股科举制度的人并非不知道改革对社会的好处，但是个人的既得利益、阶级的私利，却更为切身要紧。正如严复所指出的：“夫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变则一己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sup>⑤</sup>梁启超在剖析旧的习惯势力时也指出：“吾所挟以得科第者曰八股，今一变而务实学，则吾进身之阶将绝也。吾所持以致高位者曰资格，今一变而任才能，则吾骄人之具将穷也。”<sup>⑥</sup>

应当指出，即使在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顽固、守旧势力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维新派与之相比，“不过千一与之比，其数极少。”<sup>⑦</sup>维新派在长沙时务学堂的遭遇，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教育上改革与反改革斗争的一个缩影。该校是在湘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和学政江标赞助下，由谭嗣同等人主持的。当时任上海《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应聘到校主讲，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欧榭甲和谭嗣同等人任中文分教习。学堂内揭橥时务，研究学术，讨论政治，师生之间亲密无间。学生按日作札记，定期缴呈教习批改。梁启超等维新派在讲课和对学生的札记的批语中，激烈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观念，宣传平等民权学说和变法主张，为维

① 《湘报》第4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24、25页。

③ 谭嗣同：《上欧阳瓣廌书》，《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册第923页。

④ 张之洞：《劝学篇》。

⑤ 严复：《上今上皇帝万言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327页。

⑥ 梁启超：《论变法后安置旧大臣之法》，《戊戌变法》第3册第33页。

⑦ 严复：《论中国分党》，《戊戌变法》第3册第76页。

新运动酝酿思想,准备干部。该校与《湘学报》、《湘报》和南学会的活动,使湖南维新运动为当时全国各省之冠,因而成立仅数月就遭到守旧势力的猛烈攻击。1898年3月7日,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以封建卫道士自居,声称要“保卫圣道”,纠集一批劣绅向具有维新倾向的湘抚陈宝箴递交《湘绅公呈》,攻击时务学堂“阴行邪说”,专门培养“无父无君之乱党”,使学生“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并要挟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摒退维新人士,气焰极为嚣张。这一无理要求被驳回之后,王先谦又伙同叶德辉等人,煽动他们控制下的三个书院的部分守旧学生,订立所谓《湘省学约》,炮制诸如“正心术”、“尊圣教”、“辟异端”等条规,以加强对三个书院学生的控制,防止他们受时务学堂的影响,他们连篇累牍地攻击维新派“倡平等”是“陋纲常”,“伸民权”是“无君主”。不仅如此,他们还罗织罪名,排挤南学会主讲人,殴打《湘报》主编,并串连同乡京官向清廷上奏攻击维新派。

显而易见,维新派的改革主张和改革实践,触痛了守旧势力的神经。配合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革,维新派在今文经学的外衣下,重新解释了孔子的思想。他们虽然也提“中体西用”这个口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赋予这个口号的政治目的和内容是同洋务派完全一致的。洋务派认为,“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史大法无不具备,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满足矣。”<sup>①</sup>而维新派所讲的“中学”,是经过改造的。如他们讲民权,就把孟子说成是提倡民权的祖师;他们讲平等,就把孔、墨说成是首倡平等的先驱。维新派所讲的“西学”,则不只是指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而且还特别强调资产阶级进步的社会政治学说。也就是说,西学不仅包括科学,更应当包括民主。他们认为,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而奉公”<sup>②</sup>,因而对西学中的政学尤为重视。梁启超曾建议效法日本,尽速建立政治学院,以培养变法人才。他说:“窃惟西国学校,种类非一,条理极繁,而惟政治学院一门,于中国为最可行,而于今日为最有用。……日本变法以学校为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重。”<sup>③</sup>很清楚,维新派的“中体西用”的主张,灵魂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是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鸣锣开道的。他们一反以往士大夫空谈性理、玩弄词章、无裨实际的学风文风,认为在国难当头之际,不论是空谈心性的宋学,还是琐屑考据的汉学,都是使人们脱离实际、磨损志气的精神鸦片。因而主张学术应当干预现实生活,“凡不依于实事,即不得为儒术。”<sup>④</sup>那么,现实生活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当时现实生活中两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反对外国瓜分,争取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也就是所谓“求强”和“求富”。他们指出:“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sup>⑤</sup>维新派进一步认识到,西方富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教育普及,不仅有受教育的机会,从事农、工、商业的国民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机会,妇女也应该有受教育的机会;如果“无女学,则四万万之民去其半矣。”<sup>⑥</sup>而要普及教育,就必须反对八股和弓马的文武取士制度,设立大、中、小学以及各种专业学堂;大批派遣留学生,乃至各级官吏和亲王大臣也应到外国考察。

① 张之洞:《劝学篇》。

② 严复:《论世变之亟》,《戊戌变法》第3册12页。

③ 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52—153页。

④ 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405页。

⑤ 严复:《救亡决论》,《戊戌变法》第3册第62页。

⑥ 《中国除害议》,见《戊戌变法》第3册第122页。

维新派在提倡学习西方、改革教育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同帝国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帝国主义分子披着传教士的外衣,常自诩是西学的当然占有者,千方百计地插手中国维新运动,妄图把运动引向殖民主义的歧途。实际上,他们宣扬的西学,相当大的部分是神学、宗教之类的内容。他们诋称什么基督教乃是“泰西富强之根基”,是一切科学的本源。这种谬论,遭到维新派的揭露和批驳。严复在《耶稣流行论》一文中,揭露外国传教士宣传的所谓“西学”,实在“与中国巫覡所为不甚相远”;他所译的《天演论》,更给传教士所传布的神学以沉重攻击。康梁还用提倡孔教的办法来抵抗耶教,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爱国的性质。

帝国主义分子往往使用两面手法,他们一面勾结封建统治者,一面又假装同情维新运动。美国人林乐知1897年抛出《治安新策》,与英国人李提摩太1896年炮制的《新政策》沆瀣一气,如出一辙,除了提出由外国人充任中国政府部门的顾问之外,还提出中国办学校要“敦请英美等国之学部大臣来华掌其事”,或者干脆把中国各等新式学堂交给传教士来办,还说什么这才是救中国的“唯一方法”。如此娓娓动听的建议,无非是妄图达到由美英等国来“共管”中国的目的。

维新派虽然对披着传教士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的真面目还认识不清,不了解什么叫文化侵略,甚至对他们还抱有幻想,但是对他们培养买办式的人才显然是不满的,抨击说这种人才只能是“上之可以为洋行之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sup>①</sup>梁启超对当时“一切教习多用西人”的现象,也甚感痛心,认为“天下事之可伤可耻,孰过此矣”。<sup>②</sup>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围绕着要不要废八股、变科举、兴学校,要不要学西方这一焦点所展开的教育上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决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其实质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垂死的封建地主阶级之间进行一场严重的阶级交锋。

### (三)

戊戌前后的教育改革,使中国教育进一步挣脱了封建体系的束缚,向近代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产生了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同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

戊戌前后教育上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第一次大规模地冲击了封建主义传统的旧教育体系。明成化以来沿用五百年之久的八股取士制度一度被取消而代之以策论,1905年清廷不得不宣布废止科举制度。以湖南为例,戊戌时期,由于八股取士制度被否定,取士以实学实用为标准,许多“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的年轻人踊跃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其数不可算计”。一批新式普通中小学堂、专业和技术学堂,“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sup>③</sup>其他各地也然。到1901年,据统计,武昌一地学校即达90所,江苏99所,四川150所。<sup>④</sup>我国第一所近代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也正式成立。与学堂相辅而行,提倡科学、宣扬民主的学会也如雨后春笋,同样成为维新派培养干部、集聚力量的基地。“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sup>⑤</sup>

①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后》,《戊戌变法》第册第页。

②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师范》,《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143页。

③ 《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303—304页。

④ 章开元林曾平:《辛亥革命》上册,第327页。

⑤ 《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2册25页。

“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sup>①</sup>这就叫做大势所趋。大批青少年在新式学堂里，接受了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成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先驱。1902年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其成员蔡元培、章太炎、蒋维乔等人，多是新式学堂的骨干。戊戌前后的新式学堂，尽管课程设置并不一致，但与那种以单纯学习外国语和专业技术为主旨的洋务学堂不同，而是重视西学中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对中学则注重学以致用。维新派教育家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以培养资产阶级的新政治、新经济所需要的人才。在教育方法和学校管理等方面，维新派也作出了建设性的改革，比如采用班级授课制、编写新教材、推行新教学法，以及反对体罚，提倡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提倡学生协助教师搞好学校管理，开展校外游历活动等等。这些在康有为1891—1894年主办的万木草堂中，都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尝试，随后在1897—1898年的时务学堂得到了继承发展。梁启超还是我国近代系统介绍、提倡各科教材教法的第一人。维新派对中国女子教育和学龄前儿童教育也大力提倡。梁启超曾在《变法通议》一文中专门论及女学。1898年，我国第一所女子特设学校——经正女学，由经元善在上海创办。此外，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思想，在戊戌时期亦已开先河。如果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教育打开了封建传统教育的缺口，那末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教育改革思潮，对于封建教育的废除和资本主义新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确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作为戊戌时期教育改革的又一成果是，出国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人数骤增。1986年第一批留日学生仅13人，而到1904年已达1300余人。<sup>②</sup>留学运动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形成潮流，应当说是同戊戌时期教育改革中所确定的学西方的方针分不开的。留学运动加速了先进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的传播，造就了一支最先觉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他们终于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戊戌前后的教育改革在历史上树立的丰功，其影响是深远的，其意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维新派的教育改革，当时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他们虽然提倡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对八股科举的抨击不遗余力，但是他们进行改革所依据的理论武器主要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在教育改革与整个社会改革的关系问题上，维新派又往往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他们以为通过改革教育，就可以使社会最终获得根本的改变，这样就过高地估计了教育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掌握在谁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不掌握政权，教育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完全地实现。维新派的改革家们在戊戌时期还没有、也不能认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奴化教育的实质，这是他们的教育改革最终归于失败的又一个原因。

戊戌时期的教育改革作为整个维新变法运动的一部分，它遭到夭折的厄运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因素，但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先进人物，为了拯救祖国、改变祖国积贫积弱的命运，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思想来改造中国。他们虽然是改良派，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改革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① 欧集甲《论改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戊戌变法》第3册156页。

②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

③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